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2001

论苏轼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承继与革新

王友胜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苏轼无比热爱与尊崇陶渊明其诗其人, 他全方位、多角度地效仿、学习陶渊明, 极力推崇、升华陶渊明,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艺术都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在进退出处上, 陶渊明五仕五隐, 进退自如, 率性自由, 随遇而安; 苏轼对他心慕手追, 视其为对抗挫折、化解苦难的精神偶像, 敢于讽谏, 遭遇三次贬谪而不悔, 虽向往田园从未归隐。在文化追求上, 陶渊明当窗抚琴、临水吟诗, 将个人精神生活全面展现于诗文之中; 苏轼步趋先贤, 通过读书、写作、饮酒、赏音、谈禅、修道及交友、雅集等文化活动, 着力营造精神空间, 凸显高洁的人生品格。在耕读持家上, 陶渊明退隐田园, 荷锄勤耕, 修建草房, 能耐寂寞清苦; 苏轼虽以罪臣之身在贬所躬耕自持、补贴家用, 但他以陶渊明为楷模, 身处逆境之中, 却能将枯燥乏味的劳动生活过得生意盎然。

关键词: 苏轼; 陶渊明; 生活方式; 生活艺术

中图分类号: K244;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2-0001-08

Su Shi'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ao Yuanming's Lifestyle

WANG Yousheng

(Research Bas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al Cul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u Shi held immense affection and reverence for Tao Yuanming, both as a poet and as an individual. He imitated and learned from Tao Yuanming in an all-encompassing and multi-faceted manner, vigorously praised and elevated him, and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ao Yuanming in both his lifestyle and his art of living. In terms of engagement and withdrawal, Tao Yuanming moved freely between official service and reclusion five times, acting with natural spontaneity, adaptability, and inner freedom. Su Shi admired and emulated him, regarding Tao as a spiritual idol to withstand setbacks and alleviate suffering. Su dared to offer satirical remonstrance, experienced three successive relegations to the south without regret, and though he longed for the pastoral life, he never withdrew into full reclusion. In cultural pursuits, Tao Yuanming played the Guzheng by the window and recited poetry by the water, fully expressing his inner spiritual life through his literary works.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is ancient worthy, Su Shi endeavored to cultivate his own spiritual space through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drinking, appreciating music, discussing Zen Buddhism, practicing Daoist cultivation, socializ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literati gatherings, thereby highlighting his noble and unsullied character. Regarding farming and scholarly life, Tao Yuanming retreated to the countryside, diligently tilled the fields with a

收稿日期: 2025-10-30

基金项目: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课题“东坡文化研究”[HNSK(ZDZX)22-15]

作者简介: 王友胜, 男, 湖南常德人,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hoe, built a humble cottage, and endured solitude and material hardship. Although Su Shi, as a disgraced official, personally farmed in his places of exile to supplement his household income, he took Tao Yuanming as his model. Despite adversity, he was able to infuse vitality and poetic grace into the otherwise tedious and arduous labor of daily life.

Keywords: Su Shi; Tao Yuanming; lifestyle; art of living

苏轼后半生逐步对陶渊明其诗其人产生了无比的热爱与尊崇,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艺术都受到陶渊明的深刻影响。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一文大段引述苏轼语曰:“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在苏辙看来,苏轼不仅欣赏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更对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格情操有着强烈的共鸣,表示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努力践履其生活模式。实际上,苏轼多次遭遇政治挫折和人生困境,但能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与他深刻认同、努力效仿陶渊明对待出处的态度以及化解苦难的策略不无关联。苏轼在屡遭挫折打击后,从贬官黄州开始就特别推崇陶渊明。他逐步认识到陶渊明对消解生活苦难的价值与意义,试图效仿陶渊明的言行与品质,终于明白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自由且从容不迫地展现。

一、进退出处:“只渊明,是前生”

作为隐逸诗人之祖,陶渊明一生安贫乐道,躬耕陇亩,不慕荣华,崇尚本色,试图去掉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回归一个具有童趣的“真我”,其人其诗已经成为中国封建文人的楷模与典范,具有可供效仿与步趋的范式意义。在无数陶渊明文化人格的践履与学习者中,苏轼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位。他后半生景仰、追慕陶渊明,元丰五年(1082)在黄州所作的《江城子》一词曰:“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2]353}陶渊明不满现实政治,不愿折节屈膝而五仕五隐,耕种读书,其中第一次出仕是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当时29岁,第一次做官,担任江州祭酒;第二次出仕是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到五年(399—401),当时35岁至37岁,

被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召为军府参军;第三次出仕是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三四月间,镇军将军刘裕召为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三月,建威将军刘敬宣委任其参军之虚衔,派其赴京递交辞职表;第五次出仕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秋八月,应辟为彭泽县令。苏轼则是以罪臣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自持、补贴家用。在该词中,作者以陶渊明自许,将其视为自己的前生,效其躬耕南阳陇亩之为,耕种于黄州之东坡。苏轼同年所作“长篇独白体”词《哨遍》序云:

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槩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2]388-389}。

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实现归隐的理想,但对陶渊明弃官归隐的行为非常赞赏,甚至倾慕。全词以陶渊明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归去来兮辞》为蓝本,注入个人生命体验,表达归隐田园之乐。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结束黄州贬期,登庐山作《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即曰:

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挂冠不待年,亦岂为五斗。我歌《归来引》,千载信尚友。相逢黄卷中,何似一杯酒。君醉我且归,明朝许来否?^{[3]687}

这组诗通过对“佚老堂”的题咏,既展现了苏轼对友人闲适生活的赞赏,也暗含了他自己对进退出处的思考。这里他再次歌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赞扬陶骥不贪恋官位,追求自由生活,称自己是能承继陶渊明风骨的后人,将陶渊明视作跨越时空的隔代知音及值得敬慕学习的良师。诗还表达了与友人相逢时的愉悦心情,约定明日再聚,充满了闲适与洒脱的意境。陶渊明不待致仕而挂冠归隐,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以及酒醉后“我醉欲眠卿可去”的不拘小节、潇洒从容,

均对苏轼文化人格的形塑产生了积极影响。该诗其二转向夸赞陶骥，“似闻佚老堂，知是几世孙。能为五字诗，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节，自号葛天民”^{[3]687}数句，用陶渊明“葛巾漉酒”之典，借赞陶潜后裔、“小靖节”陶骥，表达对陶渊明的无限敬慕与景仰之情。

苏轼在惠州、儋州能够消解人生苦难，成功实现主体身份与人生思想的转变，陶渊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苏轼在惠州期间，自信地将陶、葛二氏与自己并为“三士”，认为可画为“三士图”。他的组诗《和陶读〈山海经〉》其一云：“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3]1227}陶、葛两人一为隐士、一为道士，足见作者追求闲适、回归自然的心情。苏轼贬居惠州时，除创作和陶诗47首外，还决心在生活方式与精神境界上以陶渊明为榜样，从《和陶贫士七首》其一“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3]1207}以及《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3]1228}中可以看出，他殷切希望真正做到《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一文所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4]2115}。苏轼在儋州的精神支柱依旧是陶渊明，他将从江州李姓州守赠送的“字大纸厚”的《陶渊明集》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的“柳文数册”并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夫》其十一）^{[4]1627}。阅读陶、柳二集，成为苏轼谪居儋州时期的重要精神生活。

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欲官则官，要隐则隐，如庄子靠编草鞋过日，向监河侯借米一样，他没粮后就去乞讨，有心情就去做官，显得十分真诚。陶渊明曾作《咏贫士》七首，各诗相对独立，而又有分有合，自成一气。其中前两首为总述，自陈自己贫困萧索之状及不平之情，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二句，启以下五首，分咏荣叟、黔娄、袁安、张仲蔚、黄子廉等历代贫士操行妙理。如第四首曰：“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5]125}这几句高度赞扬战国时齐国隐士黔娄安贫守道、淡于功名的美好品节。特别是他的《乞食》诗，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晚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彰显了诗人朴拙真率的文化个性。诗云：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

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劝，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5]48}。

诗中既有“叩门乞食”的卑微，又有“谈谐赋诗”的从容；既有对他人恩惠的感激，又暗含“非韩才”的自尊——展现了陶渊明在生存压力下，如何以精神坚守化解物质困窘的独特人格。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此诗作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陶渊明62岁，体弱多病，饥寒困顿，不得不向人乞食。一说此诗作于陶渊明青年时期，大约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陶渊明21岁，当天在朋友家饮酒后写下此诗。苏轼最为看重的正是陶渊明这种率性自由、随遇而安的文化品性。其《书李简夫诗集后》对此分析极其透彻：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4]2148}。

苏轼受其影响，作《和陶乞食韵》诗曰：“庄周昔贷粟，犹欲舂脱之。鲁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辞。渊明端乞食，亦不避嗟来。呜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3]1279}作者一连举出庄周贷粟、陶渊明乞食与颜真卿乞米等数位古代贤哲不以贫贱为愧的例证；又曾引陶潜《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两句，名其拟建的小亭曰“容安”，即不嫌以狭小住处作为安顿自己灵魂的精神空间。以上均旨在表达自己追慕陶渊明，生活上坚守固穷守节、顺遇而安的传统。

苏轼生活上虽不至于乞讨，但他愿意通过与友朋的感情联络与热情赞助，解决自己在贬所生活与医用物资的短缺与不足。基于苏轼的人格魅力，仍然有人远道来访或通过各种途径给予苏轼生活帮助。其中慕名远道来访者，如郑清叟自惠州渡海拜访苏轼，向苏轼请教仁义之道，带来循州知州周彦质所送的粟米；吴子野两次渡海来儋州探望苏轼，带来苏轼遇赦内迁的大好消息，陪伴苏轼同归大陆。《史记·汲郑列传》载：“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6]正是这些人的无私襄助与深情慰问，让处在黑暗中的苏轼能够看到光明、感到欣慰。他在给程天侔的信《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中，请求予以帮助时说：

寄觥佳酒，岂惟海南所无，殆二广未尝见也。

副以糖冰、精面等物，一一铭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惊怍之至。此间纸不堪覆瓿，携来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4]1626}。

又在《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二中问“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4]1627}。对于朋友的物资帮助，作者感念不忘、惶恐惭愧；如有需求，即直接开口，字里行间，全无客套，足见双方关系非同一般。郑嘉会甚至“欲于海舶载书千余卷见借”^{[3]1294}，故苏轼在《和陶赠羊长史》诗中说：“我非皇甫谧，门人如挚虞。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3]1294}苏轼在儋州能完成《书传》十三卷的写作，也多赖郑嘉会两次借书。故苏轼《与郑靖老四首》其三曰：“《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4]1675}

苏轼阅读陶诗，唱和陶诗，维护陶渊明的文化人格与文学地位，陶醉于陶渊明的精神世界，甚至不愿一次性读完陶渊明的诗。他曾在《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中说：“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4]2091}又埋怨《文选》采摘不多，其《题文选》谓“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4]2093}。诚如一位宝物收藏者不会一次性用完自己的财富，他每天都能从阅读陶渊明的作品中得到生活的快乐。中晚年的苏轼为对抗人生挫折，跨越时空找到了知音，其《与子由六首》其五载，“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4]2515}。他认为古今诗人，唯有陶渊明最合自己的标准。苏轼也特别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与人生态度，但对其政治思想并不完全认同，还批评柳宗元为人荒诞虚妄，如不该称扬吕温过甚，也不该称扬吕温弟吕恭“贤豪绝人”^[7]。苏轼对待陶渊明的态度却大不一样，容不得他人批评陶渊明，因萧统仅选陶渊明作品数首，又讥评其《闲情赋》，故批评其“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甚至连选录《闲情赋》的《文选》也一同否定，批评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均见《题文选》）^{[4]2092-2093}杜甫虽为大家，但他的《遣兴五首》其三对陶渊明颇有微词：“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8]苏轼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陶诗具有“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独特诗风，

这是杜甫所没有注意到的。

苏轼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开始创作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至绍圣四年（1097）贬居惠州，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和陶诗”109首，固化对陶渊明的深刻认同，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盛名。其中元祐七年（1092）七月所作《饮酒诗二十首并引》是他最早的和陶组诗，首句即谓“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3]1054}，觉得自己缺乏陶渊明的从容与闲适，表示要积极去践履陶渊明的足迹。苏轼和陶并不追求形式与字面的近似，而是力求在精神上走进陶渊明，所以舒岳祥《刘正仲和陶集序》云：“东坡苏氏和陶而不学陶，乃真陶也。”^[9]陶渊明淡泊名利、处穷能安的生活态度，在苏轼那里得到传承。经过苏轼、朱熹等的弘扬，以及南宋汤汉的《靖节先生诗注》对其《述酒》《咏荆轲》等作品的集中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轼对陶渊明的心追手摩始终贯穿其后半生，成为其对抗挫折、保持快乐心境的极好方式。

二、文化追求：投身自然，娱情诗酒

在古代作家中，陶渊明是第一个将自我的个体生活全面展现在诗文作品中的人。作为陶渊明的隔代知音，苏轼深受影响。他暂退官场后，极善营造个人精神空间，其读书、写作、饮酒、赏音、谈禅、修道、游观、交友及饮食等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无不彰显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旷达的人生态度。苏轼的生活书写与生活艺术虽在理论上多渊源于庄子，但在践履力行上则主要仿行陶渊明。陶渊明早年接受过儒学教育，曾在《杂诗十二首》其五中表达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5]117}的远大志向；又受道家思想影响，特别喜好自然，其《归园田居》其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5]140}。《与子俨等疏》亦谓“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5]188}。这种儒道兼融互补的人生价值观其实也为苏轼所认同，并积极践履。苏轼的思想复杂，儒学是其本色，而以释、道为用。陶渊明常蓄无弦琴，萧统所撰《陶渊明传》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

辄抚弄以寄其意。”^[10]苏轼其实不善音律，有些不十分合律的词还遭到李清照《词论》的批评，但他最理解陶渊明珍藏无弦琴的真意，其《和陶贫士七首》其三说：“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11][2138]}在苏轼看来，有弦之琴只能弹人间之乐，而无弦之琴却能寄托无穷之音，所谓大音希声是也，故其《和陶东方有一士》诗曰：“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3][1242]}诗中的“君”指陶渊明，以“无弦琴”和“非指弹”两个反常意象，构建出“形骸之外”的审美境界。南宋李吕《酬令裕见寄之作》诗亦曰：“伯才不鼓琴，良为知音撤。渊明琴无弦，荆扉昼常闭。”^[12]“伯才”即俞伯牙，此旨在表达陶渊明的世无知音之感。陶渊明关闭柴门，隔绝世俗纷扰，却在独处中与天地精神往来，此时的“无弦琴”已成为他与自我、自然对话的媒介，无需向外求“知音”，自身便是知音。

陶渊明仕途遭受挫折后，能投身自然、寄迹山水，生活乐观自信、随心随性，其诗文中构建的诗意生活成为包括苏轼在内古代文人的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他的《饮酒》其五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5189]。

这首诗着意于自然美的描写，主要表现诗人热爱田园生活，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人生的意趣。全诗可分为两层，其中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后的感受；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如果说这首诗是总体着眼、大处书写的全景观照，那么他的《移居二首》就是从具体生活落笔，细微处见真情，别具一种风神。其一曰：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5156]。

作者自述从前拟迁居南村，并非那里宅地好，只因当地有很多“素心人”能与自己朝夕共处。他多年来移居南村的心愿，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以后可以与邻居经常往来，高谈阔论，特别是共同欣赏奇文，一起剖析疑难文义。其二云：“春

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5157]作者将自然之美、人际之暖与生活之真融为一体，通过“登高、呼酒、相思”等日常场景，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坦诚的理想生活图景，读来令人心生向往。作者接着述说置身自然，真切感受到春秋晴朗天气的美好，可以与朋友登高赋诗，邻人间也可以互相招呼饮酒，若有农活时便各自回去耕作，有余暇时便彼此想念，享受过从之乐。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陶渊明转向展示自己且读且耕的耕读之乐：“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51133]“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51133]作者先写屋边绿树扶疏之景，再叙耕种过后返回家中阅读喜爱的书，欢快地斟酌春酒，采摘园中的蔬菜，泛读着《周王传》与《山海经图》。他认为这种生活是最高层次的精神之乐，俯仰之间纵览宇宙，没有什么事情比此更为快乐。

苏轼一生得意少，失意多，包括读书、入狱与任职，他八次在汴京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才十年有余。这一独特的政治经历，给了苏轼接触自然山水的绝佳机会，他步武庄子、接续陶渊明等前贤，将不时迁转的山水内化为安顿心灵的精神空间，将枯燥乏味的生活过得生意盎然、富有诗意。面对挫折，他潇洒应对，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尽情快意人生。其《江城子》序云：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2]352-353}。

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正月五日游斜川，写下《游斜川》诗，描绘山水之乐与生命之悟，成为后世文人追慕的“归隐雅游”典范。词曰：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51353]。

作者神交异代，通过“雪堂即斜川”的联想，

遥想陶渊明与友朋临水登山的诗意情境;他躬耕东坡,构筑雪堂,仰观后丘,俯察微泉,与陶渊明产生共鸣,达到真正的“斜川”不在山水之间,而在心境的超脱与自足,将庄子精神层面的逍遥之游转化为实际生活的斜川之游。全词远观近察,雪堂周边之鸣泉、小溪、山亭、远峰,耸层城之孤秀,具斜川之静美,既在眉睫之间,又有八荒之趣。如果说陶渊明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诗化,那苏轼就是将陶渊明的诗歌生活化,强调回归自我,强化诗人身份,从而为自己也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的闲居山水是一种主动寻求逍遥自在的行为,而苏轼的亲近自然却是被贬后作出的无奈选择。

三、耕读持家:开田垦地,自给自足

陶渊明出身显赫,曾祖父或为东晋大司马陶侃;外祖父孟嘉为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其名或岱或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5]28}的人。但到他这一代,已门衰祚薄。其《五柳先生传》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晏如也。”^{[5]175}自陈生性喜爱喝酒,但因为家里贫穷愿望常常不能得到满足。虽然简陋的居室空空荡荡,遮挡不住风雨和烈日,粗布短衣上打满了补丁,盛饭的篮子和饮水的水瓢里经常是空的,可他依旧安然自得。陶渊明在多次归隐田园期间,亲自耕作,修建草房,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饮酒》其十九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5]198}作者因苦于饥饿,29岁时抛开农具去为官。始仕为江州祭酒,然内心却为此而感到羞耻,不久即归隐田园。苏轼却不同,他只是在官场受到排挤打击后为补贴家用才不得已去耕种,贬官黄州、惠州与儋州期间的耕读生活大多出于这样的缘由。

陶渊明耕种的田地有多处,翟氏夫人也一同参与劳动,据其诗文所记,知其所耕种的地有“西田”“下溪田”及“南亩”(或称“南野”)等各处。他在《庚戌岁九日中于西田获早稻》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5]84}在他看来,穿衣吃饭是根本,种田垦地是满足生存之需的必要途径。又《丙辰岁八

月中于中下溪田舍获》曰:“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5]85}指出贫居糊口要靠务农,春季勤耕东边林,只待秋天有个好收成,田官关注秋收获,传语同我意相连,饥饿的人只图一饱,等待天明整装下地劳动。晋安帝元兴元年(402)陶渊明返归上京里,次年开春移往怀古田舍务农,当时所作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及《劝农》等诗。前诗其一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5]76}往日听说南亩田,未曾躬耕甚感遗憾。我常贫困地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所以春耕定要亲自参加。尤其是《归园田居》其一,集中地描写了其住宅环境与劳作情景: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5]40}。

作者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然后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种桃树、李树。鸡鸣狗吠,炊烟四起,一幅祥和安宁的农村图画。全诗核心意象从“樊笼”到“故渊”,情感脉络从“怅然”到“晏如”,行文结构层次分明。

陶渊明归隐期间,每天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他乐于与百姓彼此过从、互相帮助,从中得到快乐。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5]77}。《归园田居》其二:“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41}在这些诗中,作者自称“陇亩民”,与“农人”过从交集,歌颂劳动,接近、尊重普通百姓,互通有无,从中感受乐趣,同话农业收成,清苦中不乏雅致。

苏轼学陶渊明,也以农夫自许,曾在《和陶贫士七首》其七中说:“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见不适,今与农圃俦。买田带修竹,筑室依清流。”^{[3]1208}诗以“不适”起笔,以“归田”收束,通过“农圃”“修竹”“清流”等田园元素,勾勒出一幅厌弃官场、拥抱自然的生活图景。语言

质朴却有余味，将“身安”与“心安”的双重满足藏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读来如临其境。又其《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云：“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3]887}诗中一位亲民、务实、谦卑的基层清官形象跃然纸上：他不摆官架，视民如亲，甚至自降身份为“耕田夫”，这种“去官僚化”的姿态在古代官场尤为难得。他在《题渊明诗》其一中非常自负地说：“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4]2091}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均有长时间的农耕活动，其《与李公择》第九简中自陈黄州劳动生活云：“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4]1499}这简直就是陶渊明农耕生活的翻版。苏轼黄州时期，俸禄极少，家口二十有余，生活入不敷出，只得耕种东坡，开始大量从事农业劳动。他的组诗《东坡八首》是其劳动生活实践与劳动生活艺术的集中体现。该组诗叙东坡来历、环境及作诗目的云：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3]612-613}

该诗的“自愍其勤”，反映自己的“垦辟之劳”，记叙在东坡开垦、插秧到种麦的过程。内容丰富，结构完整，一事一诗，首尾照应。这片荒地的开垦，不仅是苏轼的“生存自救”，更是他的“精神重生”。如第一首：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廩何时高？^{[3]613}

叙写东坡的荒芜、劳动的艰辛、自己的贫寒及对丰收的渴盼。第四首：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3]613}。

叙写农村稻谷从播种、分秧、垂穗到舂米等自

然过程。第五首“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叙写农民对诗人在生产技术上的指导，反映自己向农民取经，学习种田知识。

苏轼在东坡种植的庄稼品种比较丰富，对此，《东坡八首》诸诗均有反映。如其二：“下隰种粳稌，东原蒔枣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其四：“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其五：“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其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3]613}由上可见，苏轼在东坡曾经种有粳稻、糯稻、枣、栗、桑椹、竹、麦等粮食作物、水果及树木类。为求播种优良品种，苏轼不断向四面八方友人乞讨树苗与种子。如向江南道人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3]637}向从蜀中远道而来的巢谷乞讨元修菜（野蚕豆）籽：“使归致其子，而种之东坡之下。”^{[3]650}为的是改良物种、增加收成。

苏轼不仅将自己耕种东坡看作贫困生活来源的补充，也视作一种精神慰藉与郁闷消遣、一种文人习禅的惯用途径与方式。他的《与子安兄七首》其一曰：“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4]1829}在给老友王巩的信《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十三中又说：“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4]1520-1521}作者躬耕的目的与效果从前揭“聊以卒岁”，到“聊以忘老”，再至“劳苦却亦有味”，均见其视劳动实践不仅是躯体行为，也不完全是为稻粱谋，而是一种打发时光的方式、一种乐以忘忧的精神活动。又其《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曰：“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3]639}他在废弃的营地捡拾破碎的砖瓦，锄除丛生的杂草，栽种黄桑，割草搭建茅屋，日晒风吹，面色黝黑。在这种日常劳作生活中，苏轼体验到参禅与志道的无限快乐。唐代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坐山习禅，躬耕自给后，农禅之风已经成为宗门惯例，耕稼等日常生活成为文人习禅的不二法门。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评苏轼《安国寺大悲阁记》云：“无

论学禅,学圣贤,均从笃行上立脚。”^[13]在躬行实践这件事上,儒和禅的看法比较一致。苏轼儒、佛兼修,自然懂得笃行的重要性,而躬耕东坡就是笃行实践的主要方式之一。

苏轼全方位、广角度地效仿、学习陶渊明,推崇、鼓吹陶渊明,这是古代任何一位大作家都不曾在他那里得到过的待遇。苏轼与陶渊明虽所处的时代相隔甚远,但两人在生活态度与生活艺术上颇为相似。如果说有所区别,主要是由双方的政治态度所决定:苏轼入世,陶渊明出世,故卫宗武《林丹岩吟编序》说:“坡之高风迈俗虽不减陶,而抱其宏伟,尚欲有所施用,未能忘情轩冕,兹其拟之而不尽同欤?”^[14]“未能忘情轩冕”是苏轼在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上与陶渊明有所区别的主要原因。他曾多次将自己与陶渊明及白居易相比,如《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者〉,戏书一绝其后》诗:“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3]1027-1028}陶渊明对形塑苏轼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人格厥功甚伟,与其说是苏轼发现了陶渊明,不如说是陶渊明成就了苏轼。

参考文献:

[1] 苏辙.栞城后集:卷二一[M]//苏辙集.陈宏天,高秀

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1110.

- [2]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 查慎行.苏诗补注[M].王友胜,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 [4] 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
-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14.
- [7] 苏轼.东坡先生志林:卷四“柳宗元敢为诞妄”条[M].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三十年赵用贤刊本,2020.
- [8]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5:563.
- [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35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4.
- [10]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7.
- [11] 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卷二一〇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817.
- [13] 樊庆彦.苏轼诗文汇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1233.
- [1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3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48.

责任编辑:黄声波